

新疆喀什地区税务干部、退役军人李红菊扎根帕米尔高原，服务边疆群众——

# 云端之上是我的“家”

■谢金明 胡 铮

##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

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塔吉克自治县(以下简称“塔县”)，是一座“云端上的县城”——地处帕米尔高原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，世界海拔最高的口岸红其拉甫口岸就坐落于此。

从2017年开始，因工作调动，在喀什地区税务系统工作多年的税务干部、退役军人李红菊，在这里安了“家”。

说是“家”，其实只是塔县税务局提供给工作人员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。然而，从任职那天起，李红菊就真的把这里当成了“家”——

到塔县任职7年，年年春节，李红菊都是通过手机视频与家人“团聚”。到山区宣传税收政策时她解囊相助的孤儿，曾经流着眼泪问她：“你可不可以做我的妈妈？”

与李红菊的交谈愈深入，笔者愈能清晰地感觉到：这位把根扎在边疆的老兵，对于人生的选择和肩头的责任，有着别样的理解。

### 关于选择

#### “哪里需要到哪里去，哪里艰苦哪里安家”

1987年，18岁的李红菊高中毕业，从家乡山东德州参军入伍，成为驻守在新疆喀什的陆军某部一名卫生员。

新训期间学会的一首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》，唱得李红菊热血沸腾，尤其是歌词里那句“哪里需要到哪里去，哪里艰苦哪里安家”，激荡着她年轻的心灵。

然而，在宁静的夜晚，第一次离开家乡的李红菊，还是忍不住想家。在那

个电话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，李红菊主要依靠一纸家书诉说思念。信一去一回，通常要等上一个多月。要是赶上部队野外驻训，可能一连几个月收不到家里的消息。

一次野外驻训期间，发生在李红菊身边的一件事，成为她走向坚强的“成人礼”。

那次驻训前，李红菊的一位战友利用周末外出的机会，到集市上给母亲买了一顶红毛线帽。毛线还没寄出，部队便向驻训地开拔，战友想着等驻训结束再把毛线寄回家。谁知驻训期间，战友的母亲因车祸不幸去世。毛线再也送不出去，李红菊久久地抱着悲痛着的战友，眼泪浸湿了军装。

看着战友强忍悲伤依然坚持参加训练，心中难以平静的李红菊，对那句歌词有了更深的理解——

“哪里需要到哪里去，可不是拍拍胸脯那么简单。戍守边疆是军人的责任，靠的是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……”

1991年，即将退役的李红菊，面对人生中又一个选择题。回乡还是留疆，对于许多戍守边防的官兵来说，这道题并不容易作答。有战友幽默地提议，不如抛硬币来决定。李红菊抛了几次硬币，戏剧性的是，每次都是有字的一面朝上，意味着“留下”。

其实，在抛硬币之前，李红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“当兵几年，我已把这里当成‘第二故乡’，留下是发自内心的选择，也想为新疆建设发展作点贡献。”李红菊说，不管抛硬币的结果如何，她都会选择留下。

安置到喀什地区税务系统后，李红菊从一名文书做起，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，用心学习税务知识，后来转岗成为税务员，业务能力日渐成熟。

2017年，塔县税务部门急需业务骨干，李红菊被列为候选人之一。见其他两名候选同事家庭负担较重，李红菊主动请缨：“我的孩子刚刚考上军校，丈夫

也常年在部队。塔县条件虽然艰苦一些，我能想办法克服……”

就这样，李红菊成为站在祖国边境线上的税务人。

### 关于坚守

#### “根扎得越深，越能经得起风雨洗礼”

面积约2.5万平方公里的塔县，零星分布着4万多人口，“就像是一捧芝麻撒在了大草滩上”。与生活在这里的群众相伴的，是沟壑纵横的地貌，稀薄的氧气和远处终年不化的雪山。

初来乍到的李红菊，用一腔热情迎了上去。

作为牧区企业和群众了解最新税收政策的“桥梁”，深入牧区和山区走访宣传，是李红菊和同事们的重要职责之一。为更好服务当地企业和群众，来到塔县的最初半年里，李红菊凭着一双“铁脚板”，走遍了所有乡镇。

一次到石矿厂走访的经历，李红菊记忆犹新。“那家石矿厂位于深山，距离县城有180多公里。”李红菊回忆，企业负责人当时正为资金周转急得团团转，没想到他们一路爬雪山、翻达坂，到山里讲解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，帮助企业化解难题。李红菊至今记得，那位负责人当时高兴得连连感慨：“你们来得太及时了！”

相较于“有形”的艰苦环境，更大的挑战是无形的压力。2018年，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，各级国税局、地税局合并，担任塔县国税局党委副书记、副局长的李红菊被任命为改革办主任。一时间，千头万绪的工作压上李红菊心头。

采访中，李红菊的同事们回忆，那段时间推进会、讨论会不断，常常忙到深夜。随着政策落地，相关制度规定、操作流程发生很大变化，在电话中难以

向缴费群体讲解清楚，李红菊就带领大家直奔乡镇。在做好政策培训的同时，面对给群众答疑解惑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地处“天边边”的塔县，实现政策落实全覆盖。

那段时间李红菊几次感到身体不适，到医院检查，结果令所有人吃惊：她得了甲状腺癌。

“如果不立即手术，在高原地区继续保持高压工作节奏，病情发展可能超出控制……”医生的劝说，让李红菊陷入犹豫。可一想到点多面广、量大线长的工作，她还是决定“赌一把”。相关工作走上正轨后，李红菊才接受了手术。

近几年，考虑到李红菊的身体，上级几次提出调她到海拔低一些的地区任职。每一次，李红菊都选择留下来，正如她曾对同事们说的那样，“根扎得越深，越能经得起风雨洗礼”。

### 关于奉献

#### “苦地方，也是干事业的好地方”

有人说，在高原工作，躺着也是一种奉献。李红菊并不认同：“苦地方，也是干事业的好地方。人无论在哪里，都要用心用情做事，努力干出一番业绩。”

采访李红菊时，她正计划到牧区进行政策宣传。出发前，她照例去了趟商店。“每次到牧区，她都要给乡亲们捎去各种生活用品，车子后备箱总是塞得满满的。”熟悉李红菊的店主说。

提起李红菊，塔吉克族学生努尔眼里含着泪花。努尔的父亲前些年因病去世，母亲长期卧病在床。成为李红菊的“民族团结一家亲”结亲户后，一家人得到悉心照顾。

说起努尔，李红菊也打开话匣子：“有一年春节，得知我和往年一样在单位值班，努尔特意给我打来电话，让我去家里过年。其实我知道，塔吉克族没有过春节的传统，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……”

在塔县工作的7年里，李红菊结亲帮扶了10余户牧民家庭，先后资助12名少数民族学生，成为许多孩子心里的“好妈妈”。

李红菊的手机上，保存着几张特殊的“全家福”——“因为丈夫和儿子常年在部队，每年春节我们就在视频电话里‘团聚’，每次我都截下一张‘合影’。”采访中，李红菊向笔者展示那一张张她引以为傲的“合影”，脸上挂着花儿一样的笑容。

雪域高原，难觅花的踪影。把根扎在这里的李红菊，恰如一朵美丽的花。

图①：李红菊在红其拉甫边防连哨前留影。

图②：李红菊(右)到牧民家宣讲税收政策。

图③：李红菊(右二)和当地少数民族青少年在一起。

受访者供图 制图：唐 硕



深秋的皖南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凉。10月30日下午，安徽省郎溪县83岁老兵臧永元，走进郎溪县第二中学的教室。他深情地给孩子们讲起94年前牺牲在姚村暴动中的英烈们的故事。

1930年夏天，在党组织领导下，郎溪县姚村乡的贫苦农民发起武装暴动，成立姚村苏维埃政府，组建姚村农民赤卫团，进行“抗租、抗丁、抗税”的斗争。面对反动势力的疯狂“清剿”，赤卫团成员顽强抵抗，许多成员惨遭杀害。历时5个月的姚村暴动以失败告终，赤卫团成员用鲜血和生命点燃的红色火种，却在这片土地上渐成燎原之势。

“李同洲、阮大佑、阮开全、费新海、吴清福、张官成、熊恩才、陈建富……”和以往每次宣讲时一样，臧永元不用看讲稿，就能一一说出赤卫团牺牲成员的名字。从1979年到2021年，臧永元用42年时光，为在姚村暴动中牺牲的21位赤卫团成员奔走，让他们成功被追认为烈士。

是什么让臧永元踏上为烈士正名之路？一切要从臧永元母亲的心愿说起。

1941年，臧永元出生在姚村乡永丰村。在村子里，他的家庭有些不同——“我母亲在与父亲成婚前，有过一段婚姻。那位叔叔叫熊恩才，是赤卫团成员，在姚村暴动中被敌人杀害……”

小时候，臧永元常听村里的长辈讲起姚村暴动的故事，对赤卫团成员充满敬意。母亲偶尔讲起那段往事时抑制不住的泪花，扎着他的心。

1959年，初中文化的臧永元参军入伍。一次探亲时，母亲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永元，你有文化，又当了兵，娘想跟你谈个事……”母亲希望臧永元能为熊恩才以及牺牲在姚村暴动中的赤卫团成员们，争取烈士的名分。

母亲郑重的神情，让臧永元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。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后，臧永元踏上为烈士正名的路。

追认烈士身份，第一步要确定牺牲赤卫团成员的名字。臧永元没想到，仅是“第一步”，他就走了3年。

“当年敌我斗争激烈，为保证安全，很多文字材料都被销毁了。能找到的资料十分有限。”臧永元回忆，寻访之初，他只能根据母亲的回忆，到姚村乡的村庄挨个走访，向健在的知情人士一一求证。

几经辗转，臧永元陆续了解到21位牺牲成员的名字，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相关文字资料。1982年，赤卫团成员亲属张福清在自家老屋的墙缝中，发现一份当年赤卫团开会签到的名单——臧永元此前了解到的21位赤卫团成员，均在这份名单之中。

随着寻访的深入，臧永元先后两次将收集到的资料上报民政部门，为21位赤卫团成员申请追认烈士，但因年代久远，相关认定材料不够完善，始终没能等来好消息。

“不行就算了……”几次申报不成，有人劝臧永元不要“认死理”。臧永元一听这话不乐意了：“当年赤卫团为了农民打天下，不怕流血牺牲，我为他们做这点事，无怨无悔！”他坚持一遍遍到档案馆、纪念馆查阅资料，联系知情者挖掘历史细节，写一本本寻访笔记。曾在郎溪县民政局工作、如今在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任职的刘义江感慨，臧永元这些年的坚持和努力，带动更多人加入寻访队伍，让烈士身份的认定迎来

# 让烈士英名映照家乡热土

八十三岁老兵臧永元与二十一位烈士的故事

■殷超

转机。

2013年，臧永元和部分赤卫团成员亲属商量，第三次申报时，先为资料较完整的8位赤卫团成员申报。2014年5月20日，安徽省民政厅发出《关于同意追认陈建富等8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》。那一天，已经73岁的臧永元激动地和烈属抱在一起，泪湿衣襟。

寻访之路仍在继续。随着相关资料的不断完善，2021年，在臧永元的努力和相关单位密切协作下，其他13位赤卫团成员的烈士身份也得到确认。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臧永元再次流下热泪：“坚持了40多年，我对母亲、对烈士终于有了圆满的交代……”

母亲的心愿实现了，臧永元却觉得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：“这么多年过去，姚村暴动的知情人士相继离世，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讲给更多人听。”

如今，在姚村苏维埃政府旧址，在集中安葬姚村暴动牺牲烈士的陵园，在郎溪县中小学、企事业单位，越来越多的人从臧永元饱含深情的讲述中，了解了那段红色历史，同时也被老兵半生追寻的故事深深触动。今年8月，臧永元获评“安徽好人”。

上图：臧永元在集中安葬姚村暴动牺牲烈士的陵园里驻足瞻仰。

殷超摄



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，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邀请老兵代表回军营参观交流。 柳言摄



我是江苏省淮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的一名老干部，今年94岁了。人到鲐背之年，记忆力一年不如一年，许多话前面刚说过，很快就忘记了。可有一段话，我这辈子都忘不掉，那就是75年前，老教导员送给我的入党赠言。

1948年9月，初中文化的我从家乡山东禹城参军入伍，此后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。因作战勇敢、表现突出，1949年7月，上级党组织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是同批党员中唯一的新兵，入党后第四天，教导员到连队检查工作，特意找我谈话。

那天，我们面对面坐着，他亲切地问我家里的情况，对我说入党后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给战友们带好头、做榜样。谈话快结束时，教导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一段赠言——

登瀛同志留念：

你光荣地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，这说明你的任务更伟大更光荣了，你的一生应以人民的利益为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，切忌入党后可能产生的松懈自满，认为万事大吉，这样会葬送极其宝贵的革命前程。

你是个好青年，又有相当时期内足够使用的文化水平，身体又好，这些都有利于你的前进，党和人民对你寄予很

大希望的，千万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。前进吧！永远以足够的马力前进吧！我亲爱的同志。

延久

1949年7月21日

我当时就是一名小战士，对教导员具体姓什么并不清楚，只是听战友们说他念过大学，文武双全，这在当时非常少见。那次谈话后不久，教导员随大部队继续南下，我所在的连队就地驻扎下来。从此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，他写下的赠言，却一直激励我“以足够的马力前进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被组织选送到军校学习，学习结束后调到另一所军校从事教学工作，因教学表现突出，多次立功受奖。1962年，我担任原南京军区某部一支新建连队的连长，与指导员密切配合，将连队工作抓得有声有色，多次被上级评为“四好连队”。

20世纪70年代，身患肠癌的我服从组织决定，从副营职岗位离休。职务可以“离休”，但党员的使命不能“离休”。有一次，我的妻子生病住院，同病房有位群众刚做了手术，行动不便，身边没人照顾。那几天，我天天喂他吃饭，还帮他洗脚。有人看到这情景，悄悄问我：“老张，你也不觉得难为情吗？”我说：“洗个脚有什么，我是从部队退下来的，人民军队爱人民嘛！”我还对他提起战争年代的一句歌词：“老百姓爱护咱如同爱儿子，咱爱护老百姓如同爱爹娘。”帮群众洗个脚不是很正常吗？不用难为情。

1982年，干部所驻地的小区部门为加强市场管理，从离退休人员中聘请义务物价检查员。我积极报名参加，被推举为所在小组组长。一开始，有人说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，劝我别干。我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，理所应当要为人民

做事，困难再大也要干好。

一天，我发现一位顾客买的肉少了25克，便对营业员说：“你扣了她半两肉，讨了便宜，可如果人人都这样，卖东西时你也扣他也扣，最终受害的是包括你在内的广大群众。”营业员无言以对，当场保证今后绝不缺斤短两。后来我们又去检查了几次，确实斤两不少。

如今，我年纪大了，癌症治疗后遗症、“三高”症状愈发严重，做不了太多贡献，但只要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有需要，我都很高兴能参与到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宣讲中，给年轻人讲一讲自己的经历。

75年前，老教导员写下的入党赠言，在我的一次次翻看中，许多字迹已变得模糊不清。然而，那些叮嘱早已印在我的心里。有生之年，我要尽己所能，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。

(张传杰、陈海洋整理)

■张登瀛

# 入党赠言永难忘